

性戰 報告



序

郭 冬

性爱，本是世间最美丽的花。

当新时期的小说、散文、电影作家从数千年积淀的历史污水中，最先采摘了这朵鲜花时，中国报告文学家，多少还带些惶惑与顾忌。

这是一块属于历史，又归于现实的土地。报告文学作者历经了对传统文化底蕴的挖掘和对现代文明的考察后，义无反顾地揭示了中国当代人的婚姻状况，以及商品经济冲击下的人们多层次的性爱观念。这里，我们可以谛听到历史前行的沉重足音，可以窥见当代道德社会最污秽丑恶的黑暗，可以感受到作者情感的震颤与呐喊。这本书，汇集了情、性、爱的报告，然而，它却不是一支甜美的牧歌。

性与性之间，也会有潜在的对立以至争斗。也许狂热“爱恋”的土壤下，喷突着不可调和的战争岩浆；也许恼恨的厮杀后，是一湾恬静的平湖。这种被西方女权主义者称之为“性战”（Sex War）的现象，以其勃勃生机，不仅强烈冲击着当代西方的家庭与社会，也顽强地叩动着东方古

老的国度。

性欲，是人类的生物本能。恩格斯认为：“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，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，不仅要问：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，而且要问：是不是由于爱情，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？”

应该怎样回答恩格斯呢？已经向全世界宣称消灭了娼妓制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，改革年代出现了暗娼集团！远未达到结婚年龄的13岁的阿屏，懂得“相互的爱”么？她才不管“性交关系”是不是具有“新的道德标准”呢，她抵御不住“金钱堆成的海市蜃楼”的诱惑：“要获取金钱，生活下去的唯一手段，便是出卖自己的童贞”。于是，“城镇乡村留下了她的足迹，不管老的、小的；强壮的、虚弱的；漂亮的、丑陋的；有业的、无业的……只要给钱，她都愿意”；另一城市卖淫集团的“二把手”邹茗竟会“产生一种职业的骄傲”，她的话令人痛心：“如今，人人都在弄钱，千方百计，不择手段，我不过以我的方式……”（《沉沦女》）

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并不乏记载的“同性恋”现象，如同死而不僵的幽灵。它与娼妓现象为伴，在沉沉暗夜中飘飞游荡。尽管中国有识之士不断呼吁，对于同性恋与暗娼现象，这些“由社会文化、心理学、生物学、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问题，应该进行‘透明度’较高的研讨，应该运用教育、道德、改善境况、依法制裁等多种手段，进行综合治理，以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”；然而，还不待人们施展有效的手段，性病已经以其顽固的韧性，在全球范围内

向科学进行了一次疯狂的报复！当艾滋病病毒如同荒火一般急剧蔓延时，中国的性病患者也达到了 25 万人！（《性病在中国》、《性爱大变奏》）

更可悲的是，“改革”本应带给社会文明与富庶，而一些国人则心甘情愿地以文明换回了愚昧，以富庶换回了贫穷！“改革搞活——有了经济好买老婆”的“买亲活动”，在一些村庄展开了。“女人的肉体 80 块钱一公斤”，无数乡村少女在这众人认同的价格下，被迫卖亲、转亲与换亲！在这里，绵绵延千年的旧意识、旧习俗牢固地占领着长出霉点的土地，由现代商品经济发展所支撑的“人性的价值”、“人格的尊严”的意识，反而被奴隶、封建制度下的“人身依附”观念所击败！改革中的中国，口袋里装了钱币的国民，是进步了，还是倒退了呢？（《儿女大事》）

人们口袋里的钱，不一定全部转变为资本。有些钱，衍化成了活生生的人——年轻貌美的妾。在温州，就连性功能丧失者阿新都娶了妾、买了妾。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来解释，职业卖淫者尚属“自由女性”，而“妾”则是献身于男性的奴隶，是奴隶制度“一夫多妻制”的产物。可悲的是，这些甘于作妾的人，并非奴隶制抑或封建制社会中不得不依附于有钱人的“二八佳人”。她们中，有的具有较高学历，受过良好的文化教养；有的是女强人，在竞争中屡屡挫败对手。然而，“科技人员”阿萍，嫁给了“矮小、黑瘦”、已经 36 岁、有妻有子的弹棉花匠；“从小生活在道德的约束之中”、受到父母、老师严格教育的牡丹姑娘，竟在作妻、作妾之中选择了“妾”的归宿；“从千家万户聚拢

了近百万元的民间游资，操纵着上百家个体、集体企业的“女强人玉美，竟“付出一笔巨款”，“买了一个小老婆的地位”……（《性别悲剧》）

我们能够责备“改革”吗？能够归咎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吗？能够诅咒人们口袋里日益增多的金钱吗？女性性别悲剧的背后，是一幕更庞大的社会悲剧。在中国古老土地上牢牢建立了联合同盟的传统文化、传统经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社会关系，利用当前商品经济的某些畸形发展，向年轻的社会主义展开着殊死的角力。纳妾、卖淫、买亲……不过是新旧体制交错期的产物。尽管“改革”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停地推波助澜，然而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，限于历史的后拽力，并未跨过摧毁人对人、人对权力、人对宗族、人对集团的依附这一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，因而，妻与妾同样憎恨保护妇女自身利益的社会主义法制；“沉沦女”四处躲避执法人员，甘愿受辱；乡村姑娘宁肯牺牲自己的青春、爱情，为兄弟转亲、换亲！中国正处于一个混沌无序、未死方生的年代。积习多于创造，固守多于竞争，沉寂多于奋进。旧的已经动摇却尚未崩溃，新的已经萌生但尚未成长。人类的进步，少不了血泪铺就的路。作品呼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：中国唯有进行彻底的新思想文化启蒙，无数女性才能挺身夺回自我的价值与尊严，男性才能摒弃对女性合理奴役的陈腐观念，国人才能获得理念的觉醒！

如果说，新思想文化启蒙是照耀人类进步的阳光，那么，幅员辽阔的古老土地，则很难一下子沐浴在透彻的阳

光下。漫长得罕见的封建制黑夜虽然已经逝去，可它还在频频回头，还在发出执拗的回声，召唤它曾经统治过的臣民，停留在愚昧与无知的黑暗中。于是，一代代科盲不幸地繁衍在标志着结束了封建制黑夜的新中国土地上。人们不懂得性科学，甚至匮乏起码的生理常识。结婚5年的少妇菊英，因无子就诊，大夫竟发现菊英尚是处女，而“尿道已严重异常”！晋南洪洞县的“他”与“她”，“结婚好些天了，仍然不懂得过夫妻生活”，直到人们“为他们补闹了一次‘明房’（闹房者使夫妻当众性交），才使小两口恍然大悟”！学问高深的知识分子竟也与文盲一样无知。一对大学讲师，在新婚之夜，因不知如何受孕而发明了“体外受精”论，于是，他们以“相距5公分”的距离，等候着离子跳动时精卵的结合！那么，谙熟科学的医师呢？医学教育工作者呢？他们不该对人类的愚昧负有任何责任吗！令人惊异的是，中国医师的头脑里，封建文化也击败了文明科学！当苦恼不堪的同性恋者一次次求救于医生时，竟有医生厉声说：“有个地方能治，——公安局！”医师们远离了科学，性疾病步步紧逼，心力衰微的中华民族还剩下多少健康的男儿呢？据统计，中国95%以上(!)的已婚男子，“在性功能性行为方面或多或少或重或轻都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毛病。……知识分子、竞技运动员还要更严重一些”！而中国医学科学院至今未能建立一所男性病研究机构！男子汉们在接受“夫为妻纲”大尊大誉的同时，又不得不忍受着世俗棒杀的痛楚，辗转徘徊在精神疾病的苦难王国里！

中国到底出现了献身于性科学的研究者。他们踏进的不仅是世俗讳莫如深的性医学领地，也是封建观念的禁区。安徽中医附院开设了性医学专科，郑州办起了男性病研究所。水厚地医师为结婚多年“却根本不知道性生活是何物，以为象电影上那样亲亲嘴，搂搂抱抱便是一切”的夫妇进行性启蒙教育；为“欲火太炽烈”的转业炮兵连长的家庭和睦而“奔走”；熊玉玺大夫治愈了以铅丝网罩保护性器官的“阴茎勃起者”、精泄如注的少年……（《白夜》、《性医学备忘录》、《亚当的苦难王国》）他们以现代文明为武器，宣告了对传统文化、国民狭隘偏执意识的挑战！

观念变革总要有一批批先行者。也许，当我提出下面的观点时，有人不以为然：哈，“独身”也算“变革”？然而，那些积于历史、社会或个人的因素，选择了有悖于封建婚姻、道德观念的独身生活方式的姑娘们，难道不需要为抵御外力而积蓄勇气么？姑娘们对“限制自我、压抑自我”消极社会定势的反抗，是不是建筑在反抗封建观念的基点上？什么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、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，这些来自于老祖宗棺材中的古训，毕竟不能左右深知自己人格价值的叛逆者。她们理直气壮地维护着自己实现、完善自我的权利。我们不能说“变革”就是“独身”，却可以宣称，寻找使自己幸福的生活方式、生活道路的观念，本身就是对封建意识的一种变革！（《塔尖上的女性》）

性别之战，从不安于家庭的小方格子。300万大学生婚性观念的变异，引起了社会的重视。变异并非变革。

如果说，女大学生、记者颖平自愿嫁给长于她 33 岁的老科学家，是出于对“精神上的契合与自由”的“追求”，而使人无可非议的话，那么华阿林的“足踏两只船”，以及一位女大学生挑逗炊事员的“恋爱”闹剧，则反映了一种独特的现象。在校大学生华阿林崇尚叔本华“所有男人都需要好几个女人”的观点，他同时“爱上了两个姑娘。他对两人的爱都是真诚的、炽烈的”；天津某大学一位女生为了多得“一勺菜”，不断挑逗年轻的炊事员，当“炊事员对她有意思”时，“她并不在乎，多一个求爱的也挺好玩”。如果我们藉此断定华阿林与女大学生已经被西方文化熏陶为中国的“性解放”者的话，恐怕还多少带些片面性。华阿林因为装错信件，事情即将暴露，便如同疯了一般，“急得直跺脚”、“一夜未眠，脸色蜡黄”；而女大学生看到炊事员神魂颠倒地爱上了她，“不但上宿舍，还上教室来找她，约她出去玩”时，她如临大敌，意识到“必须紧急刹车”。华阿林与女大学生怕什么呢？他们不是笃信以自我享乐为中心的性爱观念，以广交异性朋友为荣么？是什么因素使他们退回到他们本以为已经诀别的传统婚性观念中？说到底，他们自以为从西方学到的“开放”的性爱观念之内里，其实倒是以中国传统道德为指归！他们惧怕的，不过是被传统文化，以及拥有传统文化的人们所抛弃！“开放”时代的婚性观念多么复杂！（《理性与情感》）

报告文学近年来名声大振、从亚流文学一跃而为文坛主潮的首要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敢于直面社会，直面人生。当小说等文学样式掉进“自我”的怪圈、“淡化”时代的时

候，报告文学却以它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，赢得了人民的瞩目和信任。不少作品以狂飚天落的宏伟气势，深邃的社会穿透力，深入进中国历史运动中逐渐积淀起来的民族文化心理内里，对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国民心态，进行了深刻的追踪与再现，剖示了国民性爱观念变革的阻力。

数千年来，中国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的农业经济形态，造就了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群体意识。这种群体意识，顽固地恪守封建纲常伦理，主张盲从、愚忠，反对任何具有个性意识的端倪显现，纵使经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冲击，这种群体意识仍旧超稳定地占据着中国大众的民族文化心理，成为社会前进的堕力。

《夕阳下的骚动》中的范寡妇，本是村民眼中的一块“活”碑。出大伙所料，她在守寡 21 年、进入 58 岁时，竟会主动“网”住一位 30 多岁的壮汉子。因为她开始怀疑“碑”的作用：“那块由别人倡导，要由她一人来塑造的碑，……于自己、于别人，究竟又有何用场呢？”范大婶以其 20 余年痛苦寂寞生涯为代价换取来的觉悟，挽救了自己的余生，这是人性的复苏，观念的飞跃！然而，这种对群体意识的公然反叛，无疑触犯了众怒。作品中的“队长”，正是这种群体意识的代言人。他的村民，以牺牲个性意识为条件的群体意识，虔诚地拥戴他的统治。当范大婶毅然追求自己的幸福时，队长“最痛心和最气愤不过”，骂范大婶“真是个不争气的东西”；全村公民们也“义愤填膺”地谴责与棒打背离了群体的范大婶。八十年代的中国，尽管跨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然而却很难铲除掉整个民族心理

中的封建群体意识，这就不能不使人忧虑中国的未来！

范大婶虽然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，然而她毕竟面向黑沉沉的历史，奋身投掷了一记标枪；可悲的是，在中国大地上，还有千千万万的女性（抑或是男性），成为封建群体意识宰割的牺牲品，被威严冷酷的传统文化心理所吞噬！

千千万万的中国公民仍旧生活在封建观念的重轭下，自觉自愿（极少数属被迫）地成了封建文化祭坛上的牺牲！传统文化心理仰慕与恪守的，不过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古训与旧制，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被人们不屑一顾！云南西北角的山乡，村民结婚历来不领取结婚证书，这种有悖于婚姻法的习惯，被历代村民庄重地维护着：“大家承认了，就是法，没承认，合法也不算数！”

个性的愚钝与失落，导致了群体社会的衰败与萧条，而中国群体社会的衰败与萧条，又加重了个性的愚钝与失落。中国历史跌进了恶循环的怪圈！

唯有懂得自省的民族，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。

本书选编的11篇报告文学，在揭示当代中国婚性领域诸种社会现象的同时，也展示了中国光辉灿烂的未来。它告诉人民，历史也许会在黑暗中盘桓许久，也许会为每一小步前行付出沉重的代价，然而，历史不会沉寂，它必将追随自己看得见的光明前进。作品呼吁人们关注妇女的解放，指出女性的最终解放，正赖于社会所进行的全方位的深刻改革。

这是一块属于历史，又归于现实的土地，愿各位读者

喜爱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朵鲜花！

1989年春节，北京东环路。

目 录

序	郭 冬 (1)
白夜	麦天枢 (1)
性医学备忘录	季 宇 (43)
夕阳下的骚动	寻 坚 (68)
亚当的苦难王国	涂白玉 (93)
性病在中国	康 健 (141)
性爱大变奏	万瑞雄 (188)
沉沦女	庞瑞垠 (223)
性别悲剧	贾鲁生 (284)
儿女大事	张湘东 杨全国 (370)
塔尖上的女性	吴基民 (394)
理性与情感	朱幼棣 (418)

白 夜

——性问题采访手记

麦天枢

启蒙——八十年代的中国童话

她 23 岁，他 25 岁，结婚已经 5 年。因为他是“独子”，因为她父亲是村支书，他们比法定年龄提前两年“领了证”。

本来是一对正当年华的少夫少妇，却已为无后果的婚姻各自苦苦折磨了多年。自从新婚第二个周年后的不凡天起，他们就结伴踏上了漫长的求诊之路：乡里看中医，吃了无数单方验方；县城里看西医，一次又一次确认这对不能怀孩子的青年男女身体并无异常；不算宽裕的家庭甚至不让他去后崖的石场打工，让小夫妻夜夜都团聚在那眼“喜”字早已消退的窑洞里。然而，婚龄 5 年已届，这对身体壮实、无疾无病的夫妇，就是没丁点儿血脉贡献给思孙如命的父母。

秋收过了，老父亲卷起一迭子人民币，领着儿子媳妇，走进了省城这家名气最大的医院的妇产科。

那场面是令人凄酸的。媳妇菊英，已暗暗哭过好多
次，眼睛肿得象对熟桃。因为她知道，公婆下了决心：要
是菊英真不会养，这媳妇就得另娶，杨家不能断了根；虎
林脸色与父亲一亲冷木无神：如果是他的毛病，这杨家一
脉单传，到他这哒就算完了。因此，看门诊的郭大夫——
一位细心开朗的女医生用吓人的嗓门问病情时，作父亲的
竟然也顾不得回避，蹲在旁边低下脑袋听。

疑疑惑惑的郭大夫把菊英疑疑惑惑地领进隔着张白帘
子的检查室去了。当她领着脸盘、脖颈都羞成一团红的
“病人”出来时，嗓门里响着哈哈的笑声，问作丈夫的：

“你是咋搞的”

——菊英是处女！

郭大夫不愧是大夫，不愧是个爽朗人。笔者找到她的
办公处，解释了半天才提起话头，她接过来就上了正题：

“性这个东西，男女这事情，年龄到了，跟婴儿生下
来就会吸奶头一样，本来是无师自通，是本能的。可这对
小青年，一个个精爽爽的，小伙子还念过初中，咋就连个
尿道阴道都分不清？”

“那小媳妇也真憨，真是乡下女人，——尿道已严
重异常，想来每次都疼痛不堪，一问就羞得捂脸，也不知
这五年是咋过来的！”

春暖花开时节，我终于有机会来到这个黄河岸边叫作
崖前的村庄。

村口一堵泥石结构的方屏风正中，挂了一个精致的金
属牌子，上面“文明村”三个大字给人许多神秘感；可当在

炕头里坐稳，与一群半大汉子先虚后实地聊起“夫妻的事情”时，嘻嘻哈哈的笑声里，笑出许多让人不能笑的道理来。

“我们怎么懂得的？小女女穿开裆裤的时候，谁还没见过那是个啥东西？房里的事，十四五的时候听下三烂故事，冬天在生产队看羊的长窑里，守着盆羊粪火，哪个不听一世界？村里头，这事情还愁没个来路？噢，你问他——牛脖子他爷，我们都叫牛爷子的，队里笑话大王，要活着，听三夜也没个重的！”虎林的堂兄虎石说到这，指着炕角里一位中年汉子，指出一窑洞的笑声。

大约觉得在外来的“干部”跟前如此“夸”他故去的爷爷不恭，“牛脖子”白了虎石一眼，急慌慌地解释：“别听他瞎说：咱这的习惯，爷爷辈跟孙子辈开玩笑是没个正经的，哪个当爷爷的都这样。”

的确，这个村子与周围的许许多多村子，曾经保持着许多有趣的习惯：爷爷可以当众问孙媳妇“上怀了”没有，孙子可以抓住爷爷在裆里“捉猫”；小叔跟嫂子开玩笑，可以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当众骑在肚子上解裤带，嫂子们可以把小叔用裤带捆在树干上光溜溜地晒屁股；姐夫可以拿“房里事”与内弟媳当众“凑热闹”……

新婚之夜，新郎新娘的同辈岁小者和爷爷奶奶辈们，点灯提蜡闹洞房，笑声喧天里几乎把关于作爱、关于遗传的一切都导演给被闹的少男少女。洞房散后，“听房”的把戏无奇不有，心眼多的小叔子能早早地藏在新人被卷里，直到被发现才笑声连天地奔出来；不光不会惹讨厌，谁

“闹”得最有花样，谁“听”得最明白，不光新人一家觉得光彩，听者父母也会为儿子自豪……

正是在这些听来不“雅”，想来有“理”的习俗中，古老的山村才将被文明打入地下的关于两性之合的一切，尽可能连绵不断地从这个有限渠道中遗传下来。既然我们高贵的方块字、高贵的讲台、高贵的电视广播都是伟播高贵的内容的，被视为“低下”的东西却又必须与高贵或低下的人相伴随，那么，它只能选择“低下”的方式顽强地延续。

然而，今天的崖前村，由于进一步走向“文明”，这些虎石、“牛脖子”们津津乐道的“过去”，已成了一串久远的故事。

至于“闹房”“听房”史，似乎是到“牛脖子”哥哥结婚那年为止。那时“文革”正热闹，城里红卫兵下来帮着斗“地富反坏右”，这边噼噼叭叭放炮仗，那边来了群有文化的宣讲了一通“无产阶级新风尚”，径直把“牛脖子”们筹划妥当的“闹”和“听”宣布成“四旧”了，于是年复一年，“东山”没能再起。

至于“牛爷子”，死了有两年了。说起这位至今仍被孙子辈们毫无恶感地念叨在嘴上的老人，菊英的父亲，崖前村支书老陈，有着一番非常庄重的评价：“村子里，啥人都有。这老人啥都好，就是放了一辈子羊，闲时总爱给小辈们叨叨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影响不好。那几年批‘四旧’，支部的人跟他说叨了几回，也真就改了，日后晚上早早就睡，孙子们去了还往外赶，算是个老长进吧……”

他大约以为我是来采访“文明村”里的文明的，临走找

给我一份乡里打印的材料。在这份题为《崖前村支部建设文明村的先进材料》的白纸上，油墨清晰的铅字中有这样的段落：

崖前村有着多年的好传统：无偷摸现象，无打架干仗，邻里和睦……在建设文明村活动中，他们提高了标准，进一步严格要求，倡导文明新风。现在结婚闹房、听房，办红白事挂帐，吃席讲排场等不良现象都已杜绝……村里过去有个老人，人称“故事爷”，常常给青年们讲些男男女女的事，严重地影响了青年们的思想健康，经过支部耐心作思想政治工作，不光老人不再传播，老人死后，也不再有人传播那些故事……

材料末尾，并排盖着乡党委的公单和乡党委书记的私章。

虎林没有见着，他到内蒙古买牲口去了。据说，几个月前从医院回来，含含糊糊终于说清了“病”因，作娘的笑着骂了声“没出息”，他便笑着躲开了。从此愁眉一展，后岭开石也去，邻县买种也去，“活泛泛”一个小伙子了。

菊英在家，听说已经“有了”，一上门，看热闹而来的青年人就把她“羞”进邻家了，一面之后再也没见着，当然也就难以谈什么。实际上，就我要采访的内容来说，也不可能谈什么。

应该说，他们算是幸运的。在生儿子的意识压迫下，他们终于找到了郭大夫，而笔者所知的另一些“启蒙”故事，就有着浓浓的残酷成分了。

——皖东定远县，我在法院关于一桩离婚案的卷宗里